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形成考略

丛密林, 邓星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运用二重证据法和实地调查法, 结合地理环境和生产力发展, 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考证。研究认为火、弓箭的发明与马的驯化是骑射形成的先决条件, 气候变冷与马具的创造是骑马民族骑射形成的直接原因,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人群是最早进行骑射的北方民族, 骑射的出现早于专业化游牧民族的形成; 随着游牧民族政权的更迭与互动, 弓马用具不断被发明、创造和完善, 促进了骑射传统的发展演变; 地理环境是维系骑射传统生存发展的土壤, 对大自然的崇拜与依赖, 衍生出诸多与骑射相关的祭祀娱乐活动。在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 通过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形成的考述, 审视中国古代体育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体育史;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 骑射传统; 地理环境; 马具弓矢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0)05-0027-08

A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tradition of the nomadic nation in northern China

CONG Mi-lin, DENG Xing-hua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double evidenc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a historically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tradition of the nomadic people in northern China.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pre-conditions to creat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are the invention of fire and bow as well as the domestication of horse, and the direct reasons to creat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for nomadic people are chilly climate and the invention of harness; the remaining people with upper culture in Xiajiadian may be the earliest northern nation that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are on the back of the horse, and the advent of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may be earlier than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nomadic nation; with the interaction and iteration of the regime for nomadic n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nvention, cre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harness and bow, promote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traditio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must be the soil to maintain survive and develop for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tradition, and the adoration and dependence for the nature also evolves lots of sacrifice and creati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with multinational count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ffect and realistic meaning of Chinese ancient sports through investigating and reviewing the formation of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tradition for nomadic nation.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the nomadic nation in northern China;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traditio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arness and Yuya

收稿日期: 2020-01-15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9T12074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等资助项目(2018M640793);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资助(NJYT-17-B16)。

作者简介: 丛密林(1982-), 男, 教授, 博士, 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理论与体育史。E-mail: congmilin@163.com 通信作者: 邓星华

中国史籍中,常以“长城以北,引弓之国”^{[1]2902}“逐猎往来,居无常处”^{[2]5349}“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3]等描述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又以“控弦”“弓马”等词汇指代骑兵与骑射。骑射传统贯穿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狩猎娱乐、祭山祭祖以及骑兵作战等诸多领域,可谓之草原体育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共筑中国古代文明。北方游牧民族地处欧亚草原的东端,其兴衰更迭影响范围甚广,南进中原,北抵贝加尔湖,东到朝鲜半岛,西至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骑射传统既可以成为身体技能资本和武装力量对外征服与扩张的主要手段,又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鉴、传承与传播的对象,在游牧民族社会生活和骑兵作战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不同族群互动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游牧或草原文化的形成,且存在“西传”与“本土”产生之争,关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形成演变问题却鲜有问津。从骑射的形成条件看,尚需对马的驯化、骑马民族(骑马游牧民族)及其骑射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演进次序等问题进行考证;从骑射的构成要素看,还需阐明哪些因素怎样影响骑射传统的发展演变。鉴于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将通过地理环境和生产力发展两个维度,对其相关问题进行历史考证与阐释。

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及其骑射传统的构成

北方民族主要包括中国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古今少数民族。学界认可林幹^[4]对中国北方民族的“五系(广义)”“三系(狭义)”划分以及金毓黻^[5]对东北民族“三系(除汉族)”划分,两者构成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族系划分的基本框架。北方游牧民族族系的划分亦在此框架内,是指曾活跃在中国北方蒙古草原及东北森林边缘地带,过着“随水草迁徙”“居无定所”的诸多阿尔泰语系骑马民族,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几个特征,主要包括3个族系,即匈奴系统的匈奴、北匈奴、南匈奴以及屠各、卢水胡、铁弗等;东胡系统的东胡、乌桓、鲜卑、柔然(蠕蠕)、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突厥系统的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回鹘)、薛延陀、黠嘎斯、畏兀儿等。北方游牧民族骑射就其本身而言,是由人、马、马具、弓矢及技艺等要素构成;从骑射相关维度看,它是游牧民族狩猎活动、军事训练、骑兵作战中的必备条件,亦是祭祀、民俗节日及休闲娱乐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起源问题应结合当时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围绕本身构成

要素形成过程进行考证,而发展演变问题要依照三系主要民族政权更迭以及各阶段生产力发展进行阐释。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形成溯源

普列汉诺夫^[7]认为人类的手脚分离是由于某种地理环境特点形成的,在人类无条件地屈服于自然的时代,“切勿过高估计思考在工具产生中的作用,他们与其说是发明,毋宁说是碰到的。工具在开始时完全不是制好了的东西;例如偶然碰到的,我将说,在游戏中使用的尖石可能成为最初的小刀。也只有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地理环境的特殊属性促进人类手脚分离,并为劳动工具的创造提供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孕育时期的某些运动文化要比其他的文化形态起源要早,尤其是那些与生存技能密切相关的运动形式更是如此。骑射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发展技能,它的形成依赖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因此,按照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发展脉络,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亦有其自身的形成与演变规律。

2.1 火、弓箭的发明与马的驯化是骑射形成的先决条件

用火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重要标志,弓箭的制作则是以火的使用为前提,是人类延长四肢的一项重大发明。恩格斯^[8]说:“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 and 较发达的智力。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至决定性的武器。”旧石器晚期,出现磨制和穿孔技术,标枪、鱼镖和弓箭等复合性生产工具的发明,提高狩猎和捕鱼效率。华北地区山西朔州峙峪文化遗址出土大约 2.8 万年的石镞。因古代弓、箭竿多为木质,经千万年地下尘封,多腐烂残缺,留世甚少,故峙峪文化遗址中的石镞被学界认为是弓箭出现的最早实物证明。在遗址中发现至少 120 匹蒙古野马,88 头野驴的动物化石^[9],因此“峙峪人”又称为“猎马人”。她们将石镞镶嵌在棍棒的前端当做长矛,但多数还是用于弓箭^[10],以此猎取草原动物。《吴越春秋》^[11]载:“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于是神农、皇(黄)帝。弦木为弧、剡(削)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这则史料记载虽与考古发现的情况有所冲突,但可以看出弹弓、弓箭、弩的起源顺序,亦可窥见弓箭在神农、黄帝的传说时代已从生产生存的功能兼具军事功能,成为部落战争的利器,而骑射的形成首先是以射箭的

产生为基础。

马的驯化是多元起源中心问题,中国是东方马种重要起源地。河北桑干河流域发现的三门马被公认为是现代马的祖先,西方学者亦承认蒙古人先祖约在五六千年前已驯化马匹^[12]。三门马的尺寸略高于近代蒙古马(体高在 1.25 m 左右),但小于国外的马种。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因天然的地理条件,利于马群的繁殖。

《史记》卷 110《匈奴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12879]“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1177]周孝王为抵御北方戎狄令非子为其养马并赐地封号为秦嬴。公元前 302 年,“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12885]。由此认为中国北方地区是驯马、养马的发祥地。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亦可看出,中原地区将骑射运用在军事上是源于效仿北方民族。因此,欲厘清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的形成问题,还需阐明骑马民族、骑马游牧民族与骑射之间的相互关联和逻辑演进次序。

2.2 气候变冷与马具的创造是骑马民族骑射形成的直接原因

《辽史》卷 32《营卫志中》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13]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居住在蒙古高原和森林边缘的严寒地带,过着游牧生活方式,体格上高大健硕,性格上勇敢顽强且好战尚武。林沅^[4]认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形成关键因素是气候、人群迁徙及对草食动物的利用等。可见,气候变冷是中国北方专业化游牧民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约从公元前 6 000 年至公元前 2 000 年,中国北方西起甘青地区,东至内蒙古东部及辽西一带,形成以原始农业为主狩猎和采集为辅的经济文化形态;公元前 1 500 年左右,由于气候干冷原因,出现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的经济方式转变^[15]。此处的“半农半牧”是指农业兼畜牧业,过着定居生活,“畜牧业”主要从事动物的饲养与放养。专业化的游牧业则以骑马为标志,过着居无定所,随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在燕山以北的草原与森林的边缘地带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遗址发掘而得名,断代为中原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约公元前 11-前 7 世纪)。在赤峰市宁城墓葬中发现马衔、马镡、骨镞及青铜剑等数件,其中宁城南山根 M101 墓葬中出土 1 件青铜马衔,中间两环相套,两端各 4 个倒刺(又称钉齿),外侧并有半圆钮^[6](见图 1)。这种马

衔两端倒刺紧紧卡在马嘴两侧,是驯服烈马最好用具^[17]。马衔和马镡是驯养烈马和控制马匹行驶方向的工具,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的马具,标志着北方最早且具有实物证据的骑马民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宁城南山根墓葬发掘出土一件骑马追兔铜环,“环外侧铸有 2 个骑马人像,其中一马前有 1 奔兔像”^[18](见图 2)。



图 1 宁城南山根 M101 墓葬出土的青铜倒刺马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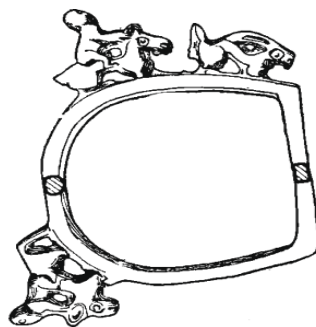


图 2 宁城南山根 M3:6 骑马追兔铜环

从“钉齿”型马衔和“骑马追兔”铜环可知,夏家店文化族群已经掌握骑射狩猎技能,游牧文明程度也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与同时期欧亚草原其他文化遗存相比,其冶铜技术和工艺水平达到极致,文化内涵完全具备“斯基泰三要素”的特征^[19]。“斯基泰三要素”是因前苏联考古学家发现了斯基泰文化遗址,故把兵器、马具、野兽纹样统称为“斯基泰三要素”,并以此来判定早期游牧民族的文明程度。此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族群还不算是专业化的游牧民族,仍过着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但已处在向早期游牧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其族群可能为山戎,后融入东胡族群演变成为专业化游牧民族。从中国北方地区骑马民族和骑射传统的形成过程看,骑射早于游牧民族形成。若从中国骑射传统的历史看甚至更早,在殷商废墟第 13 次墓葬发掘中发现 1 人、1 马、1 狗、1 弓背饰、10 镞等。石璋如^[20]认为在殷商已有骑射。于省吾^[21]认为:“在殷商

卜辞里又有‘先马’‘马射’的例子，那末，可以肯定的说过，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在卜辞中出现的“马”“射”“先马”“多马”词多为官名，至于为何种骑射方式还需进一步考证。而在殷商时期出现骑马和骑射也不足为奇，因为马的驯养时间远比骑射要早，但与骑马民族的骑射性质截然不同。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马主要是用来驾车，从殷商废墟出土情况看，一车四马比例较多，马匹数量一般是车的 4 倍。因此说，中国北方骑马民族的骑射形成于夏家店文化时期，随后游牧文明程度逐渐成熟加深，并由内蒙古东部辽西地区由东向西拓展传播。

3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发展演变

1) 匈奴时期低鞍马鞍、马络头与鸣镝的技术革新丰富骑射传统内容。

匈奴时期马具最大的进步是改进鞍饰、攀胸、腹带、马络头以及骑士的弓箭武器，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鞍马文化的兴盛和古代骑兵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在阿尔泰西北部索罗涅什地区西比尔可墓葬出土 1 件牵马纹透雕铜带饰，断代为公元前 5 至公元前 3 世纪，具有匈奴文化的特点^[22]。该铜饰最显著特征是马背上有鞍垫或称低鞍马鞍，以及用于固定马鞍的腹带和胸带(又称攀胸)；马络头的基本结构亦在匈奴时期基本定型。马络头，又称马笼头、辔头，是由额带、颊带、鼻带和咽带等组成，两带相交有节约，额带中央处的饰物叫当卢，又称马锡。节约和当卢出现较早，商周时代即有，但多用于驾车。其中马鞍是为了维持马上骑射技能的稳定性，马络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马的行驶方向。此外，匈奴“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12888]以鸣镝为信号进行骑射练习，射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匈奴是一支勇敢善战的骑马游牧民族，依靠弓马组建的骑兵，将长城以北引弓诸国皆为其所有。强盛之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2902]，势力东至辽河，西及葱岭(帕米尔高原)，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地区。北方民族发展到匈奴时期，骑射技法更加娴熟、精湛和生活化，亦是匈奴武力强盛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马具的技术革新，同时也使得骑射内容愈加丰富。

2) 鲜卑时期马镫、高鞍马鞍的改进提高骑射技能纵横向的稳定性，马甲的创造促进重甲骑兵形成。

匈奴之后，鲜卑作为北方最为强大族群，在汉晋十六国时期称霸蒙古草原。这一时期，马具趋于完备，最大变革是出现金属马镫、高鞍马鞍及马铠(具装铠)，对骑射传统产生较大影响。西晋永安二年(302 年)，长沙墓发现左侧带有小镫的釉陶骑俑，为马镫最初原型，

亦被称为上马脚扣。东晋早期(约 322 年)，南京象山七号墓出土两侧装镫陶马俑^[23]。由此可见，中原地区发现的马镫陶俑虽不是实物，但可以确认中原地区马镫的出现时间应早于北方地区。其原因有二：其一相比于游牧民族，中原的汉人更需要通过马具的改进使用提高骑射技能；其二，中原地区生产力发达，掌握强于边疆游牧民族的矿产资源、冶炼技术、工艺技能及墓葬习俗。马镫因起源于中国，又常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靴子”。英国史学家怀特认为马镫的发明虽简单，但历史意义重大，它把畜力应用在战争之中，让骑兵与马融为一体^[24]。“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中世纪的骑士就不能身披闪闪盔甲，救出处于绝境中的少女，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25]。

马鞍的发展大致经历过裸背、鞍垫、低鞍鞍、高鞍鞍 4 个阶段。《春秋经》载：“成公二年(公元前 589 年)，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鞍，齐师败绩。”^[26]鞍字古无它意，则以地形为马鞍型得名，并以此判断春秋时期可能有马鞍的雏形^[27]。战国末期是从无到使用马鞍的过渡时期；秦与西汉早期骑兵俑无前鞍鞍，利用肚带和马尾尻部的鞅带固定，缺少胸带，鞍的位置偏后；西汉末年，鞍鞍马鞍出现。晋代，高鞍鞍马鞍普遍流行，出现网状后鞅带，利于鞍具的固定；北魏晚期，鞍鞍略有变化，前鞍鞍高且直立，后鞍鞍矮而后倾^[23]。

马镫和高鞍马鞍的出现，使马具更加完备，加之马铠的使用，催生重甲骑兵的形成。马铠在中国古代又称之为“具装”或“具装铠”^[28]。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重甲骑兵空前发达，马铠主要是铁制，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和寄生 6 部分组成^[29]。显而易见，马铠主要是在骑兵作战中用于保护战马，其中寄生具有装饰美化之用，兼具保护骑兵战士后背功效。史籍中常有关于南北朝时期马铠的记载，如《南齐书》卷 1《高帝上》载：“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太祖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30]恩格斯^[31]曾说：“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自魏晋以后的 2 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马铠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有机质到金属、从粗糙到精湛的发展阶段，至南北朝时期发展成熟^[32]^[018]。隋朝时期，马铠继承南北朝时样式得到空前发展。隋大业七年(611 年)，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拥有骑兵 40 队，分 4 个团，每团均配铁质马铠和皮质兽纹马铠^[33]^[160]。隋朝覆灭，改变骑兵骑射战术发展。唐朝时期，骑兵多效仿突厥，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继而掀开新篇章。

3)隋唐后不同形制弓矢促使骑射功用趋于多样。

隋唐时期,北方草原突厥、回纥(回鹘)、库莫奚和契丹最为强大。唐末五代北宋之际,契丹迅速崛起建立辽王朝。契丹的骑射传统在东胡、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基础上有一定继承性和发展,并受到唐宋的影响,使弓矢马具的制作更加精湛,开始向精美和繁复方向创新发展,契丹鞍更是获“天下第一”的美誉。弓的制作历史久远,早在《周礼》就曾记载王弓、孤弓、夹弓、庚弓、唐弓、大弓的区别和作用^[34]。北方游牧民族所用弓多为角弓或称马射弓,是用筋角制成的复合弓,形制小,强度高,适合骑射。突厥“有角弓、鸣镝……善骑射,性残忍”^{[33][864]}。辽墓出土弓的数量有限且残缺不全,多为桦木质,但在给北宋皇帝生日礼物中亦不乏有“黄桦皮纒楮皮弓”“红锦袋皂雕翎獬角骹头箭”和“青黄鹞翎箭”^[35]等奢华之物。弓的性能虽受制作材料的制约,但对骑射功用影响更大的则是不同形制的箭镞。荀子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36]

箭镞的发展亦是漫长历史过程,在距今 2.8 万年前已经有石镞存在。但最初阶段箭镞的形制应更为粗糙简单,可能为上古传说时代所言的“剡(削)木为矢”,后随生产力发展,出现石镞和骨镞,其形状有柳叶形、三棱锥形、四棱形等。到商代青铜箭镞出现,大量使用带脊双翼铜镞。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箭镞出现倒刺。直到汉代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大量铁箭镞。到魏晋南北朝以后,铁镞完全取代青铜箭镞,此时箭镞形制较多,在鲜卑人的墓葬中发现宽刃铲形、菱形等形制。唐朝之后箭镞的类型逐渐增多,主要依赖于中原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为了满足不同兵种的需要。契丹人个个精于骑射,箭镞的类型种类繁多,既继承了唐宋箭镞的样式又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经文献查找和实地踏查,大致归纳出契丹的箭镞有铲形、三角形、三角倒钩形、鱼尾形、月牙形、U形、尖驼峰形、柳叶形、三棱形、凿形、三翼形、桂叶形、扁圆形、多锋尖形及鸣镝 15 种类型(见表 1)。

表 1 辽墓出土的契丹箭镞类型表①

序号	镞的类型	图形	序号	镞的类型	图形
1	铲形		9	三棱形	
2	三角形		10	凿形	
3	三角倒钩形		11	三翼形	
4	鱼尾形		12	桂叶形	
5	月牙形		13	扁圆形	
6	U形		14	多锋尖铁	
7	尖驼峰形		15	鸣镝	
8	柳叶形				

契丹箭镞用于骑射有 3 种用途,一是用于骑兵杀敌、攻城。其形制包括柳叶形镞、三棱形镞、三翼镞、凿形镞、桂叶形镞、扁圆形镞等。这类箭镞在辽墓中发现数量最多,整体呈流线型,锋刃尖利,发射后速度快,射中目标接触点小,力量集中,穿透力强,威力较大,易穿透士兵铠甲^[37]。二是用于射杀动物。

其形制主要是宽刃类箭镞,此类箭镞由于杀伤面积大,射中时流血较多,利于捕获猎物。其中的月牙形、鱼尾形及大凿形箭镞亦可在战争中用来射马;三是用于礼射和习射。契丹骑射礼俗主要有“射柳仪(瑟瑟仪)”“上巳射兔仪”和“重九射虎仪”。其中尤以射柳用的箭镞在史料中记载较为详细。《金史》载:“射柳、击

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38]《东京梦华录》载：“又双柳枝插于地，数骑以划(同铲)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禡(同蜡，声乍，年终祭祀之意)柳枝。”^{[39][95]}《演繁露》又载：“最后折柳环插球场，军士驰马射之。其矢镞阔于常镞略可寸余，中之辄断，名曰躡柳。”^{[39][97]}由此可见，射柳所用的箭镞为铲形镞(平刃和凸刃)，亦可能包括鱼尾形、月牙形和大凿形镞等。“射兔仪”根据骑射的目标是“以木为兔”，可推断尺寸不大且为木质，所用箭镞应为尖锋刃，以便射中目标。“射虎仪”所用箭镞应为宽刃箭镞。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在繁盛时期，其箭镞的形制类型非常丰富，亦因此造就骑射在狩猎、战争及祭祀娱乐等活动中的多样用途。

4)地理环境是形成游牧生活方式的基础，亦是维系骑射传统生存延续的土壤。

地理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自然环境是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被与动物界有机组合的自然综合体”^[40]。“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中重要内容，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关注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到欧洲文艺复兴后，以孟德斯鸠、黑格尔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下简称“决定论”)成为地理学领域主流观点。地理环境不仅在骑马民族形成过程中对骑射产生影响，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孟德斯鸠^[41]认为人和动物的发展一样，都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人类体质和心理状态、人口和种族的分布、文化水平的高低、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等，都受到自然环境的支配。黑格尔^[42]认为“自然类型”与“人民的类型及性格”存在密切关系，从蒙古高原到北非沙漠干燥高地，广阔草原和平原地带是游牧民族分布区。这一地区的财产不在于土地而在于和他们一起漂泊的牛羊。一个地方草尽水涸，整个部落又到别处。游牧生涯使他们没有固定的生存法则，因此显示出好客与劫掠两个极端。很显然，决定论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是通过直接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性来决定社会的性质。事实上，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原因，但地理环境决定民族的类型、体质、心理和种族的分布是值得肯定的。从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来看，气候多为寒冷、多风、干旱；地貌为高原、磧漠、石田(不能耕种的田)；水文为北方大小河流、湖泊；植被与动物则为草原、树林、牲畜及猎物。由于受到这样的地理环境限制，造就了随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使骑射成为北方游牧

民族日常生存技能和休闲娱乐项目。可以说，地理环境维系且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发展。

5)对大自然的崇拜与依赖，衍生出骑射相关的祭祀娱乐活动。

“自然崇拜，是宗教的发轫，任何原始民族都有此共同的尚俗”^[43]。北方游牧民族主要信奉萨满教，天地山河、日月星辰、草木鸟兽皆是其崇拜的对象。匈奴崇拜龙神，鲜卑、突厥、契丹和蒙古族的族源传说分别以“其形如马，其声如牛”“金角白鹿”“白马青牛”“苍狼白鹿”的神兽作为创生的始祖和保护神。匈奴的祁连山、焉支山，乌桓的赤山，突厥的于都军山，契丹的木叶山，蒙古的不儿罕山等作为本民族的圣山圣地。腾格里天神与柳树崇拜、向东尚左、祭山信祖等亦是自然崇拜的具体表现。突厥“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44]；“秋，马肥，大会蹕林，课校人畜计。颜师古云：‘蹕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1][289]}；高车亦有“群队驰马旋绕，百币乃止。人持一束柳棧，回竖之，以奶酪灌焉”^[45]习俗。到契丹则演变为拜天、拜山、射柳祈雨(瑟瑟仪)，亦有“上巳射兔仪”“重九射虎仪”等骑射相关祭祀杂仪活动。蒙元的祭祀敖包为那达慕的形成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土壤，使骑马、射箭、摔跤等体育项目得以流传至今。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对大自然的崇拜与依赖，促进着骑射传统不断地发展与演变。

4 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形成引发的思考

综上所述，影响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起源与演变的关键因素是地理环境和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而言，气候变冷是北方地区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定居型(畜牧)经济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马衔马镫的发明是为更好驯服烈马，亦是骑马民族和骑射形成的先决条件。中国北方民族中最早骑在马背上进行骑射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她们可能是山戎而后融入东胡族系。之后，北方民族的游牧程度逐渐加深，由东向西传播，直至形成专业化的游牧民族(以骑马为标志，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由此可判定，北方民族马上骑射的出现要早于游牧民族的形成。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相关要素的逻辑演进次序：马衔马镫的发明—北方骑马民族的出现—北方民族骑射的产生—北方游牧民族的诞生。随着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和契丹等北方游牧族群更迭互动过程，在继承游牧民族特点基础上，吸收与融合中原汉文化先进技术，弓马用具逐渐被发明、创造和完善，从而促进北方游牧民族骑

射传统不断地发展演变。从地理环境看,自然环境是形成游牧生活方式的基础,又是维系骑射传统生存延续的土壤。由此亦决定北方游牧民族大都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对大自然产生崇拜与依赖,衍生出骑射相关的祭祀娱乐活动。基于此,通过对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形成的研究引发以下两点思考。

1)从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形成审视文化的交流互鉴与传承传播。

骑射传统在产生之时主要表现为蒙古草原地区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而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则主要体现在器物层面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马镫西传对欧洲战场及骑士制度影响颇大。不仅如此,对东亚诸国也造成影响。在蒙古草原东部慕容鲜卑与高句丽争夺辽东的战争,以及高句丽南进朝鲜半岛与新罗、百济、伽倻、倭国(日本,伽倻对其影响最大)之间的战争和移民,促进中国马具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流与传播^[46]。此外,从骑射文化习俗看,呈现出继承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等特点,在保持游牧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又表现出对中原汉文化的交融性。如射柳源于匈奴的“蹕林”(绕林木秋祭);鲜卑无林木,竖柳枝驰骑绕三周。高车(铁勒)用人持柳,驰马旋绕。契丹变俗为射柳祈雨(瑟瑟仪),亦为拜山祭祀和娱乐活动的内容。蒙古在元朝时期与中原汉族端午节相结合,成为定期的节令性民俗活动,宗教祭祀功能逐渐弱化。

2)从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形成考察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性。探讨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形成,并不局限于对其产生与发展本身问题的历史考证,更应该通过“骑射文化”的透视作用,考察体育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骑射传统既是身体动作技能,又是维持北方游牧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技能,它与生产生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和政治等方面交织在一起,体现出中国古代体育体系构成的复杂性。另外,从研究维度来看,也不能仅从体育学科的角度进行思考,更要结合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军事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这又体现了中国古代体育具有多重功能和价值,对重塑新时代中华民族体育理论体系具有启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文化”像一面镜子,其历史演进过程就是在书写一部中国古代民族体育史和交融史,透视着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与交融性、差异性与统一性,映射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深层内蕴。

注释:

①本表资料依次来源于《内蒙古敕汉旗沙子沟、大横

沟辽墓》(1987),《北京顺义安辛庄辽墓发掘简报》(1992),《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2号辽墓》(1988),《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1996),《河北丰宁五道沟门辽墓》(1996),《阿鲁科尔沁旗先锋乡和双胜镇辽墓清理报告》(1996),《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2004),《齐齐哈尔市梅里斯长岗辽墓清理简报》(1993),《赤峰市红山区西水地发现一座辽墓》(1992),《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辽代壁画墓》(2003),《吉林双辽高力戈辽墓群》(1986),《辽宁阜新县契丹辽墓的清理》(1995),《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地发掘报告》(1983),《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1997)。另有部分馆藏及实物照片,在此不再列图。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居士集卷12·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02.
- [4] 林幹.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6-7.
- [5] 金毓黻. 东北通史上编[Z].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 1986: 19-27.
- [6]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292.
- [7] 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 博古,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75: 112-113.
- [8] 恩格斯.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0-21.
- [9] 贾兰坡.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2(1): 39-58.
- [10] 尤玉柱. 黑驼山下猎马人[J]. 化石, 1977(3): 13.
- [11] 赵晔. 吴越春秋: 卷9·勾践阴谋外传[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149-150.
- [12] 谢成侠. 中国养马史[M]. 修订版.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1: 4-24.
- [13] 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73.
- [14] 林沅.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M]//侯仁之. 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95-146.
- [15] 韩茂莉.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J]. 考古, 2005(10): 57-67.
- [16]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站.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J]. 考古学报, 1973(2): 27-39.
- [17] 田广金. 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

- 展[M]//牛森主.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3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7: 45.
- [18] 刘观民, 徐光冀. 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5(1): 137-138.
- [19] 沈爱凤. “斯基泰三要素”探源——上古亚欧草原艺术述略之一[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3): 33-38.
- [20] 石璋如. 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J]. 考古学报, 1947(2): 22.
- [21] 于省吾.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J]. 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1955(2): 96.
- [22] 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到早期匈奴时期[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44.
- [23] 杨泓. 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J]. 文物, 1984(9): 45-54.
- [24] 伊赫. 以镫的发明与鲜卑力士搏狮纹金牌考[N]. 内蒙古日报(汉), 2005-10-20(7).
- [25] 罗伯特·坦普尔. 中国: 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M]. 陈养正, 译.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995: 178.
- [26]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28.
- [27] 孙机.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J]. 文物, 1981(10): 82-88.
- [28] 杨泓, 李力. 中国古兵二十讲[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190.
- [29] 杨泓. 中国古代兵器通论[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202.
- [30]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5-6.
- [31] 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562.
- [3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3]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34]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标点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43.
- [35] 叶隆礼. 契丹国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16.
- [36]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 荀子新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40.
- [37] 刘冰. 浅谈辽代弓箭[M]//魏坚.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2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558.
- [38] 脱脱. 金史: 卷35·礼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26-827.
- [39]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注[M]. 邓之诚,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0] 夏征农, 陈至立.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437.
- [41]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张雁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275.
- [42]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91-92.
- [43] 丁山.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3.
- [44] 李延寿. 北史: 卷99·突厥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289.
- [45] 魏收. 魏书: 卷103·高车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308.
- [46] 王巍. 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J]. 考古, 1997(12): 66-84.

